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四日出版

百學集刊

三民主義周刊



第一卷 第二十一期

本期目次

釋共將來與共現在..... 傅築夫

個人社會行爲的發展與訓練..... 王書林

根據和條件與社會關係..... 王冠青

白話詩住那裏走?..... 余亞甫

小烹集(三)..... 紹虞

明代禦倭軼聞(三)..... 方相韓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五角

經售處各大書店

三民主義週刊社 編輯者及

重慶春森路三十號

釋共將來與共現在

傅統夫

傅先生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他在本刊第二十期所發表的「大同社會的完成階段」一文的續篇，其目的在說明：總是被馬克思的學說來分析，中國現在也是不適宜於共產主義的革命，因為馬克思相信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所孕育出來的東西；如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僅徒，真的瞭解了馬克思主義，就應當認識缺乏資本主義一個階段的中國社會，並未具備孕育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即不應以馬克思的方法來從事社會革命，而自陷於矛盾之中。中山先生深知社會經濟的演進原則，所以他的民生主義在共將來，而不共現在在，以新進的方法達到大同的共產社會。希望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青年，要細心去讀這篇文章。

編者

三民主義最容易被敵人曲解的是民生主義，而民生主義中最容易被敵人曲解的是大同主義。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其與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

我今天來分列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黨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與分別的還是方法。

我們所說的民生主義，目的就是要對付貧富不均，所以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其方法不同。

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就是實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家人能夠共產，不過其方法不同，延共將來，不是共現在。

這五點說明了民生主義的第一及第二兩層中，都是在說明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關係。總結起來，總理的意思有三：（一）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二）兩個主義的目的完全相同，不同的只是在方法；（三）共產主義是共現在，民生主義是共將來。這三個問題，總理在民生主義的講演

中，本來都已分別的解釋明白，但是因為這些問題，不僅是一種學理上的問題，而且牽涉到實際政治，即牽涉到國共兩黨的理論與政策，所以便有人來斷章取義的加以曲解，甚至說民生主義不如共產主義一體而一。十幾年來政治上的糾紛，社會上的不安，以及青年之徬徨歧途，無一不是直接間接的與這個問題有關。多少人都因為沒有正確的瞭解三民主義，和沒有正確的瞭解馬克思主義，而作了不正確的宣傳與曲解的犧牲品！兩個主義之所以易被曲解，是由於下列三種理由：（一）民生主義既然就是共產主義，那麼，為什麼不直截了當的只要一個共產主義？（二）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目的既相同，為什麼方法一定要不同？換言之，即目的既然都是共產，為什麼不採用共產主義的方法？（三）既然要共產，為什麼不共現在，而一定要共將來？

這三點從表面上看起來，都是可以言之成理的，至少在邏輯上是可以發生這樣的疑問的。一般人回答這些問題，不是說中國社會根本不適於共產，便是拿「不合國情」四個字的批語來抹殺一切，甚至連有些人根本無意問這些問題不談，而一味否認辯解，這都是對三民主義的曲解。解釋成文學，也進而說馬克思主義。殊不知這種態度，不僅不能瞭解馬克思主義，而且也不能科學的解釋三民主義，並且傳言的解釋愈多，三民主義的科學性愈

愈曖昧。因為 總理自己既明明白白的說民生主義的目的是共產社會，我們何以能說中國社會不趨於共產？如果整個的世界將來都要變為共產社會，中國何以能獨為例外？而且共產主義也並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謬論。總理說：「共產主義制度，並不是由馬克思才發明出來的，當原始人類發生的時候，便有這種制度，便是實行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民生主義第二講）。我們祖先的社會既然已經實行過這種制度，何以見得「人情不合」？至於馬克思主義說為不該罵，更是與本問題無關。所以這些討論都沒有把握住問題的核心所在，因為根本問題不是中國適合不適合於共產的問題，而是：即使如 總理所指示，中國可以共產，而這種共產也是以民生主義的方法所達成的共產，而不是以馬克思的方法所達成的共產，是馬克思的共產，而不是現在的共產。

本來應該不談共產，乃是一個理想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將來的問題，而不是現在的問題，因為現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在實行共產，（雖然也並不是真正共產，不過是準備而已），但是沒有一個國家不是在準備共產，一點一點的向這個目標邁進，儘管在客觀上一時還不能達到，然而在主觀上則都是「其心嚮往之」。社會本身既發展不斷的在進化中，則由低級社會轉變成高級社會，由不平等社會轉變成平等的社會，乃是人類社會演進的一個共同目標，隨着社會的進步，速率有快慢，總歸的說則有其趨向，然而方向總是一致的。現在資本主義經濟所達成的惡果，既經科學的解釋到全人類，而不是某一國家或某一部分的單獨問題，則整個人類自然就不會不設法來解決這一個社會的病症，換言之，即已走上資本主義的階段的，應該設法用它的束縛，去走上這個階段的，應該設法用它的束縛，於是共產社會，或大同世界，便天然成了人類的一個共同理想，都認定共產社會，或大同世界，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個最後階梯。所以不論是烏托邦的社會主義也好，科學的社會主義也好，其根本目的，都是要實現一個共產社會，所不同的只是方法罷了。總理是一個有崇高理想的人，他不僅認識了中國和世界的現在，並且認識了中國和世界的將來，他的領導中國革命的三民主義，實然是要高瞻遠矚，統籌全局，決不能使中國社會於完成政治革命之後，來重走資本主義的舊路，將來再在二次社會革命。為一勞永逸

計，便不能不設法把將來可能發生的社會問題，於其尚未發生之前，以人為的方法來避免掉，並以簡單有效的辦法，來完成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使中國社會最後能成為共產社會，或大同世界。總理自己已說：「我們學解決大同社會問題，和外國是有相同的目標，這個目標就要求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不均的痛苦，要不受這種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產，所以我們不能說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不同。我們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這樣的說法，人民對於國家，不只是共產，被選舉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對於國家是甚麼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民生主義第二講）。所以 總理之以共產為理想，乃是一個科學的結論。共產社會是未來的一個社會制度，而不是馬克思憑空杜撰的一個烏托邦，我們不必因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而便盲目的否認這個社會現象。總理所以說兩個主義的目的完全相同，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好朋友，其科學的基礎便在此。目的既都是共產社會，那麼，為什麼不用一般所謂共產主義的方法，即馬克思的方法，而必用不同的方法，來達到同一的目的呢？而且目的既然相同，為什麼方法一定要不同呢？——這才是全問題的核心所在。

這個問題雖然是一個異常複雜問題，但是說若如美國這社會者在本刊第二十期所發表的那篇「論大同社會的完成階段」，明瞭了社會演進的程序，和大同社會的完成階段，則這個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我們知道馬克思所達成的共產社會，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出發點的，照馬克思自己的解釋，一個新的比較調和的社會，其產生的物質條件，是由舊社會的階級鬥爭起來的，只有舊社會的物質條件發育成熟以後，舊社會才能崩潰，新社會才能產生。共產社會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到最後階段的階段，而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已經在資本主義的胎內孕育成熟。這個理論正應與否，不若本文討論的範圍；我們姑且承認它是完全正確，我們的結論不待不因而而改變，反因之而格外加強。因為中國社會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這一點我在「論大同社會的完成階段」一文內，已經討論過了，我想馬克思主義者不能不承認這一個客觀的事實。中國社會既然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即馬克思的解釋，便是中國社會缺乏一個孕育共產社會物質條件的母胎，即資本主義的階段，因為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是必先在資本主義階級內孕育的。這一個必然的結論，也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否認的。承認了這一點，則方法上便有了顯著的不同了，因為由資本主義的階段走向共產社會，這時資本主義「自己否定」的條件業已具備，而新社會階級可以呱呱墜地，所以革命的對象必然是資產階級，而革命的方法也必然是階級鬥爭；這是從馬克思主義本身所演繹下來的一個必然結論，不啻事實上不是如此，在理論的體系上是對的。但是中國社會既顯明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那麼，我們豈能建設一個共產社會，則第一步便不能不首先完成共產社會所必需的物質條件，而這些物質條件又必須在資本主義的階段內完成，於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方法，便很顯露了；即我們不但不能破壞資本主義，反之，我們必須先完成資本主義，——即以官商買賣的歷史使命。只有完成了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才能完成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只要我們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這個歷史的階級是無法跳過的。如果在現在共產社會的物質條件尚未具備，甚至連產生這些條件的基礎還沒有存在，我們便迫不及待的硬實行共產，這豈不是成了瘋癲？

因為出資的階段既不相同，則方針自然不能不完全不同，由資本主義的階段上出發，是種資本主義，由非資本主義的階段上出發，則必先完成資本主義。這還所謂完成，只是說補上所缺少的一個歷史階段，而不是要越說

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具體的說，便是不再走私人自由經濟的舊路，而由國家資本來有計劃的完成建設，這就是所謂民生主義的辦法。這個辦法是唯一的，只有馬克思主義者才會硬拿馬克思的方法，到中國來無的放矢，硬覺得馬克思主義的人，是不會犯這個錯誤的。而且這個錯誤，也並不只在馬克思主義本身，而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人沒有真正瞭解。因為真正瞭解馬克思主義，並能應用它來客觀的分析中國問題，則其結論必然是三民主義的，這就是說中國只能用民生主義的方法，來造成將來的共產社會，而不能採用馬克思的方法來造成。

總而言之，理想與實現理想，中間是有一定的程序的，社會的演進與主義的完成，也是有一定的階段的，方法就是適應這些實際情況而確定的，儘管最後的目的相同，而社會演進的階段不同，實際的問題不同，則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決沒有相同的道理。總理所謂「共將來」，是說最後的目的相同；「不是共現在」，是說實現這個目的的方法必異；馬克思的方法，自不妨是階級鬥爭；而我們的方法則必須是：「要製造國家資本。……並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民生主義第二講）。我們務必認清：我們所要造成的是將來的共產世界，而不是現在的共產革命，遺放了現在的共產革命，硬來遠遠不成將來的共產世界，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是應當深思而明辨的。

明代禦倭鉄開(二)

瀕海戡

王世貞集云：高帝謂和曰：日本教爲倭

「倭」當國我封皮，強爲朕一行。和乃巡視登、

國、來、淮、海、吳、越、閩、嶺、東、海、齊、魯、成、梁、

四、其、城、凡、數十、州、賜、取、其、成、本、亦、外、州、曰：余、嘗、

念、國、行、有、上、，、於、老、者、得、壽、壽、得、壽、，、不、斷、歲、歲、

自縛禦倭

湧幢小品云：胡司空松先爲嘉興撫官，嘗

印平湖，適倭寇至，議築城。公曰：民難與處

，、謂、轉、其、軍、前、禦、倭、，、百、姓、受、其、惠、，、必、、

從之，民大饗。不四月城成。

方相輯

上疏手書

湧幢小品云：胡宗憲總督浙江，先後上疏

，、皆、手、書、如、一、。、豈、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啟

，、謹、心、，、亦、自、難、及、。

備倭圖記

沐化編云：卜大同爲福建巡撫副使，時有

倭亂。公簡卒伍，積糧糶，大治糧船以待。又

備倭圖記授吏士，書悉而當。

個人社會行爲的發展與訓練

王書林

王先生在這篇文章裏，將兒童及青年底社會行爲之發展階段及其訓練原則，都與以扼要的敘述。他主張「做中學得」的教學原理來陶冶兒童及青年底團體的精神，進而養成民族主義所需要的民族意識；來培植他們的組織及自治的能力，民主的及服從的精神，進而養成民族主義所需要的社會習慣；來發揮他們的合作，互助及服務的精神，進而養成民族主義所需要的心理條件。只有這樣訓練兒童及青年，始能爲三民主義樹立下一個鞏固的教育基礎。

編者

在拙著個人的社會行爲及其發生（載本刊第十三期）一文中，我曾作如下的結論：「爲訓練或控制一個人的社會行爲起見，第一要明瞭兒童及青年的社會行爲的發展狀況；第二要佈置適當的環境隨其發展而培養其良好的習慣。……使其人格合於三民主義社會的理想人格。」本文即就這兩點再加以討論。

兒童和青年的社會行爲之種類及其發展

兒童的社會行爲依其對於他人的關係論，可分爲兩種：一是對於成人的關係，二是對於其他兒童的關係。茲分別略述這兩種關係的社會行爲之發展如下。

甲、對於成人的關係：兒童和青年對於成人的關係可從兩方面說明之：（一）兒童對於成人關係的特徵，（二）成人社會和兒童發生關係後對兒童之影響。

（一）兒童對於成人關係的特徵：初生時，一切行爲不含有社會的意義。到了一足月後，才開始有被動的社會行爲。主動的社會行爲普通在五六個月後才開始，因爲此時他的發聲能力進步，漸能了解他人的手勢或面容。稍大至七八個月時便知道避開怒容，撲向笑臉；對於生人雖表示退避畏縮，但成人若延開的接觸舉動，不久就能親近。一歲以後的兒童，往往能辨別成

人的假裝怒容，表示了解力更加進步。他對於不熱識的成人，在自覺時較趨避，不自覺時反易談話。此時兒童生活完全以家庭爲中心，父母的影響最爲重大。到了二歲半以後，兒童已有許多事情可以自動自主，父母不勝多事幫助，以減弱其獨立行爲。兒童約在三歲左右，往往表示強硬的態度。有些心理學者以爲兩強期是常態發展所應經過的；倘若此時過於和順，後來往往羸弱，不能安於一種工作或遊戲，其實所謂強硬，就是由於他已可不必要全依賴成人，但同時又不知如何合作的結果。成人應在此時對他少作不必要的干涉，使他知道什麼是社會規則。所許做和不許做的行爲，而以和平的方法，嚴格維持正常的標準，則他到四五歲後，就能與成人合作。到他六七歲進入小學的時候，教師的影響加入了。有時嚴從教師的命令重於服從父母的命令。父母和教師此時應有密切的聯絡，兩者的訓練方式應一致。父母和教師的命令或訓練方式如有衝突，往往使兒童發生困難，因而造成不適協的行爲。兒童到十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社會生活擴大，知識增加，興趣亦多，對於命令已不是像以前那樣無條件的盲從。如大大人濫用威權，管束不獨其當，往往失去兒童的信仰，及易引起反抗的行動。

（二）成人社會之影響：與兒童發生密切關係的成人社會，最主要的家庭、學校及隣居。所以它們對於兒童，影響亦最大。茲分述如下：

（一）家庭環境的影響：兒童在六七歲前，主要的社會環境是家庭。家

席中的指導人物是父母。所以父母對於兒童的影響最大。

(a) 父母對人的態度。父母是兒童崇拜的英雄，因此兒童常模倣父母的行為。社會行為的起點是由於模倣。所謂模倣的行為就是仿照着人家做的一行為。兒童不單模倣父母的語言與動作，並且模倣父母對人的態度。如父母對兒童的態度，兒童往往模倣。兒童對父母的行為。若父母不單相敬以禮，則兒童就學了恨的行為。若父母待兒童不單以禮，則兒童就學了不平等的行為。經過模倣的行為，兒童現在家庭中養成的。在家庭中，我們常看見大學生，大體平等的觀念，說得真動聽，但一來到學校，其對同學就打工友。他有了平等的觀念，但無法平等的習慣。若一個人能學中已養成了的人平等的習慣，從不解不等的觀念，亦不會隨便污辱他人。又如同情心的行為，助人的行為，有幫助的行為等亦在幼時培養。兒童不單了解什麼是氣憤，什麼是同情，但對父母倘若對於親友口無遮攔，從早就養成了不助人的，與無同情，無幫助的惡劣行為。總之，父母對兒童的態度，影響於兒童的社會行為甚大。

(b) 父母對子女的態度。父母對子女應注意下列諸點：一、父母對於子女不可愛護。兒童與子女間產生親密的行為。得到高聲者不單容易養成一種傲慢的態及疏於依賴父母的心理，而且他自身也在放蕩兒幼姊妹間的公敵。二、父母不可過度保護。過度保護則以取替父母之愛行為，就是產生一種早熟的不良心理。倘若父母在生之前，即存生一或生女一之期望，而後生男或生女，則有意中無意或影響其子女的態度。若兒童因欲得父母之愛，則又將自己飾飾與父母所期望者不同，亦易有卑劣之感。此種兒童女子多苦累。三、父母應與子女間的合合作精神。倘若父母偏愛一子女，則子女與父母間的合合作，則在容易與子女間的合合作精神。在家庭中，父母與子女間有相相相，彼此合作，則將來對社會後，自然容易與社會相相相。外國人說過，兩個人以上不單合合作。家庭教育在這一問題上，應負其責任。三、父母不應需要兒子女不需要的干涉。兒童的一切活動，在其可能之內，應充量任其自然。不需要父母的干涉。兒童的急欲情緒，或使父母生懼怕或依戀之心。如干涉有必與時，最好使之出現于愉快的情緒中，以逃避引起忿怒或懼怕的行為。四、父母亦不可過度或無條件的幫助子女。適當的幫助，如給他一種工具或教他一種方法，當

然是正當的，惟仍要兒童自己完成其工作。否則，兒童若養成一種受人幫助的習慣，則一旦得不到所希望的幫助時，往往發怒。忿怒行為的引起，常由目的不能達到。兒童忿怒的行為已經引起，則大人更不可為其時安詳計滿足其目的，如此，則兒童會養成以發怒為極端他人行為的習慣。五、兒童不論大小，多喜歡得大人的歡心與稱讚。這種傾向過甚時，亦易養成一種妒忌等不良習慣。六、父母對子女，決不可過度冷淡或嚴厲。若兒童每因此產生畏懼、怨恨、及怨怒等態度。若一個兒童在幼時對父母不單有忿怒抱恨的態度，則這種態度在將來可以類化對社會的態度。總之，父母對子女的態度，應極端謹慎，一不小心不單造成兒童一生的悲劇，並且時可以促成社會的悲劇。目前社會充滿了殘暴、怨恨、自私、家庭教育之不良，確是一個重要因子。

因為兒童不單在身體上，智慧上受了父母的遺傳，其將來人格的表現，也大都決定于父母所領導下的家庭生活。每個人都是由家庭中長大的，而家庭教育實是培養一切良好習慣及高尚觀之基石，所以，我們要想建立十個三民主義的國民，首要建立合於三民主義精神的家庭，以便培養適於三民主義所需要的國民。總理深明此理，所以在遺教中再三說「修齊治平」之一貫大道。其「最有益於政治教育」。及恢復民族精神的基本。家庭教育的重要由此可見。

(二) 學校精靈的影響。一般兒童，在六七歲時入學校，他們此時除了父母外，又開始模倣教師。在小學階段中，教師是兒童心目中的英雄。教師對於一切的態度，都可以影響兒童。將來而社會行為。所以對教師應注意以下諸點：第一、要幫助學校生活。兒童對於學校生活，應有極大的興趣。教師對於一切的生活，亦不啻於兒童的生活。若教師對於不適應的兒童時常罵，對於對於適應的兒童常加讚許，則不適應的兒童對不平等的現象，就是低低的情緒，對權威亦易取反對的態度。這些兒童，最易不守紀律，不肯服從，而對於一切表示反抗的意向。這些惡劣習慣之養成，對於一生生要發生影響。所以教師應與家庭合作，以正當的方法使兒童適應學校生活。第二、應在此時再擴大家庭中所養成的健全習慣，如格潔，助人，自強，誠實，仁義，勤儉服務，服從，守時等等，不但使其履行，而且使其對於這些習慣的意義有深刻的認識。

兒童進了中學時代，在體育，智育，德育三方面，很容易發生變化。這

個時代是身心發展的最重要的時期。而學校又是最主要的生活環境。因此，學校的學習影響，也就格外地深刻。我國中學，這個時期的教育任務，應為對於學生人格的形成，尤其具有決定性的力量。這個時期的教育任務，應為發展學生的獨立性。發展學生的基本條件有四：(一)守紀律。紀律是法治。我們應使青年在法治之下求自由發展的習慣。紀律是合於心理的齊一性，自由是合於心理的差異性。差異使社會進步，齊一使社會統一。二者都是一個健全的社會所必需的要素，我們應於不背青年個性發展的範圍內，使其價於社會化的發展。(二)盡義務。在集體生活之中，我們應使各個青年以他們的志趣，選擇他們「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生活。(三)忠團體。忠團體的心理基礎是愛團體，我們應使青年本著愛團體的心理，服務性一切，以維持團體生活的利益。這集體生活的三種條件，積而大之，就成了三民主義心理的基礎；忠團體是民族主義的基礎；守紀律是民權主義的基礎；盡義務是民生主義的基礎。學生應成了這三種良好的習慣，而後在將來她能成爲服務三民主義的國民。

(三)附近鄰居之影響——不同的社會區域在精神，道德標準及生活各方面都往往不同。兒童及青年在某種社區中長大，平日其目光，潛移默化，一切行爲都易受其影響。曾孟母擇鄰處，就是由於她認識鄰居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要。關於這一方面，我們現在還沒有什麼研究報告，所以只好以外國的爲例。美國漢來西會觀察一個小區域中，成人對兒童都抱一種親愛和幫助的態度，每當兒童走進鬧鬧街市，輒與以援手，所以一般兒童，對於成人也都有親愛；爲他們，尊敬他們之外，還對他們表示真正的友誼。反之，在古斯研究芝加哥的犯罪區域，證明生活之環境對他們的兒童，其犯罪率的數目亦愈大。據他的統計，由芝蘭中心起，在第一個英里單位內，一千個一至十七歲的兒童口中犯罪的有四百四十三個，在第二個英里單位內有五百五十八個；在第三個英里單位內有二百二十七個；在第四個英里單位內有五百五十五個；在第五個英里單位內有四百個；在第六個和第七個英里單位內則沒有一個了，這兩個報告很顯然地說明了環境對於兒童的行爲之重要性。

(四)兒童對於兒童的關係——兒童與兒童及青年與青年間最容易發生密切的關係，彼此的好惡最易引起互相的強烈反應，所以彼此的生活及行爲也最容易交互的影響。他信彼此間的社會關係之發展，可按其年齡分爲若干時期，而每個時期所自動組成的社會都各有不同的特徵。不過我們

要切實因應社會性的發展，爲編撰不窮的，由一個時期的特徵轉至另一時期的特徵是逐漸的；分期說明，祇爲便利而已。

(一)兒童初期(三至六歲)——一般兒童在三歲以前很少社會活動，其大部分時間是消耗於單獨玩弄物件之中；到四歲時才能感覺其他兒童的態度，而與之競爭。在這個時期，他們雖偶有個人的友誼，但是對團體性的反應很少；其自動形成的團體人數至多不過二三人。同時，此種小團體亦不能維持很久，普通只是十分鐘。因此，在此期中，社會的影響也在微渺。

(二)兒童中期(七至十一或十二歲)——此種兒童最喜歡與團體而不喜歡單獨遊戲。團體內的份子大致性別相同，家庭的社會地位與個人的智識程度相等，但因份子時常變動和彼此間的競爭衝突，他們的結合不易牢固。不過，這種社會對兒童有確定的影響，則毫無疑問。兒童底誠實，公平，及分工合作。其精神和習慣，差不多都是在這種社會生活中養成的。

(三)兒童晚期或青年前期(男十二至十四歲，女十一至十三歲)——兒童此時正在初中求學時代中，其團體中的份子，性別與家庭社會地位雖仍大致相同，但智力和年齡則不必一定相似。他們的團體人數較前增大，組織較前嚴密，有時且帶秘密性。他們尚有一定的領袖與領導他們的活動。領袖是他們的團體，所以能成立的一個重要要素。他的身材往往較大，具有外向的性情，社交的手腕和組織的能力。他們的智識亦較高，但與被領導者的智識似乎有一種固定的差別，而不能隨處超越。在一個平均年齡約十一三〇左右的兒童中，做領袖者的智識約在一五至一三〇之間。智識超過一三〇者，做領袖的機會逐漸減少；智識超過一六〇者，就幾乎沒有做領袖的機會。青年運動的領袖大致不外三種類型：第一類比較以自我爲中心，備有引誘力的人格；第二類比較不自私，能時時關心於團體的工作；第三類比較以事業爲中心，其精力常集中於客觀的目的。

有許多成人對於兒童此時的社會印象不良的，實際上，雖有不少兒童，時有爲非作惡，擾亂社會秩序，具有反社會性的表現。不過社會的生活，如指導得當，可是一種極好的教育。它可以訓練兒童服從和互助的習慣，可以陶冶兒童平心討論問題及虛心接受他人意見的胸襟，可以發揮兒童的組織能力，自治能力和合作精神。我們要格外注意的是：兒童在此時期已經脫離了以家庭爲生活的中心，而轉在家庭範圍以外得到各種欲望的滿足，這對兒童正常的發展是很有益的。

(4) 青春早期(男十四至十七歲，女十三至十六歲)——青年此時正處高中時期，他們的團體份子非常肯定，不十分個別，團結力極強。他們私下雖常互相批評，但對外則全體一致。他們對團體的忠誠高於一切，所以團體的訓練力極大，他們有時寧肯自殺，而不願受團體的處分，他們與父母之間每因社羣的標準和家庭的標準不同而起衝突，在他們心目中，社羣的標準常佔優勢。他們所需要於領袖的，是要能代表他們的理想。所需要於朋友的，是情誼，互信，而不是利害。所以時時結成的朋友，往往可以成爲生死之交，遺棄之交。對於異性的愛，此時亦有長足的發展。成人的干涉往往引起反感，善惡相指，都有其必要。同時他們又常帶帶比較正式的公開的團體，如俱樂部，研究會，戲劇社，文藝社或政治團體等。這些團體，如果學校當局指導有方，可收許多優良的效果。但應注意下列數點：(1)發展課程以外的興趣，(2)發展兩性間的正常社交和合作，(3)破壞學校內的秘密兒童社羣，及含有封建性的組織，並打破階級觀念，家庭社會地位觀念。

(4) 訓練兒童民主精神及民權初步的智識。
 青春後期(男十八至二十一歲)——此時青年或在大學讀書或至社會服務；生活的大部份在家庭以外，所以對於家庭的注意和興趣減少了。此時的特徵第一是工作的興趣，職業的興趣，及政治的興趣；第二是選擇終身伴侶，以便成立家庭，而作社會的中堅份子。這個時期，最足以影響青年思想行爲者，是社會的變動及趨勢，而不是學校的形式教育。

社會行爲的訓練原則

兒童及青年的社會行爲的訓練是教育的主要問題。過去教育太偏重於知識的傳授而忽視行爲的訓練，此教育不生效用的一個主要原因。今後教育的設施應本 總裁力行的道理，注意於訓練。筆者根據本上面的分析與討論，擬定訓練原則以供參考：

一、認清兒童社會行爲的發展是連續不斷地由各種環境中培養出來。在兒童的環境中，最主要的爲家庭，學校，鄰近社會及兒童自動形成的社羣。
 二、認清行爲的訓練，雖應注重觀念的了解，但是主要的關鍵則是習慣的養成。

三、養成良好的習慣要佈置各種教育的環境，而各方面環境要協調。否則，易使兒童發生不適應的苦痛。

四、注重家庭教育，家庭在社會組織是一種初級的社會團體，兒童在最幼童年，全部時間都消融在家庭中，而這個時間又是人生最富於可塑性的時期。父母的一舉一動，在足引起兒童的模倣。
 五、家庭教育要培養兒童真摯的情緒，減少兒童畏怯的情緒。愛的情緒發

揮得當，則成爲將來建設性行爲之基礎。畏怯的情緒帶有破壞性，社會的不安定，往往是由於畏怯的情緒所引起。

六、家庭中要佈置適當的環境，養成兒童各種良好的習慣，如合作，互助，服務，服從，忠誠，誠實，禮貌，平等，自由，獨立，整潔，勤儉等。
 七、以社會教育或推廣教育的方式教授已婚的成人以如何爲父母之道，使其明瞭教育子女的正常方法；遭受和過度干涉均使兒童發生不良的行爲。

八、推廣新生活運動，直接革新家庭生活，社會生活，間接改善兒童及青年的教育環境。

九、國家對於家庭環境應加以調查，凡不適宜於養育兒童的家庭，其子女應由國家自行教養之。兒童非父母個人的私有物，憲法上應明白規定兒童屬於民族國家。

十、廣設兒童保育機關，一以作家庭教育之模範，二以救養環境不良的家庭之兒童。

十一、學校教育，今後應着重於行爲的訓練，應佈置各種教育環境，適應兒童及青年的能力之發展，培養他們應有的各種良好習慣。

十二、小學應注意兒童，兒童對於環境的順應，應擴大在家庭中已經形成的良好習慣。

十三、中學應注意守紀律，負責任，忠民族等高尚觀念之了解和力行。中學時代的青年已具有組織能力，自治能力，教師應引導他們組成各種社羣，與以發展這些能力的機會。

十四、大學應培養青年的知識誠實性，使之對於所已瞭解的知識要忠誠地力行，因爲知識的誠實性之表現是知行合一。近來青年的最大缺點在不力行，視知識爲一種裝飾品。總務指示我們知難行易，總務繼續此遺教，提倡力行，這應當作爲大學施行德育訓練的最高原則。

十五、廣設兒童的遊戲場所，使兒童各種自動形成的社羣得在良好的環境中組織起來。組織各種公開的團體，使青年得以發揮其領袖能力，組織能力，自治能力，服務能力，訓練其民主精神，及合作態度。

十六、推廣勞動服務，社會服務，由服務中養成，來實踐知行力行的道理。總之，我們如果能根據以上的原則來訓練兒童及青年，則不難陶冶他們忠於團體的精神，然而養成民族主義所需要的民族意識；不難培植他們的組織能力，自治能力，民主精神及服從精神，近而養成民權主義，所需要的社會習慣；不難發揮他們的合作精神，互助精神及服務精神，進而養成民生主義所需要的心願條件。具有這樣訓練兒童及青年，我們始能爲三民主義樹立下一個固本教育基礎，始能由舊的社會產生一個新的社會。

人與社會中最低最基本的關係，莫如血統關係。以此關係為基礎，小家庭父子兄弟間的親屬關係，大之更由家族而至於民族。總理的民族主義，就是基於這種自然關係而產生。試問這種由父子以至於民族的關係，是否由於經濟上生產關係而產生的呢？當我的答復是一否！試看父親視面而兒子做工，仍不失為父子；哥哥種田而弟弟當兵，也不失為弟兄。基於自然血統而產生的天倫關係，絕不隨經濟生產關係的轉變而變化。這種深植在人類社會紙上的基本關係，以及由這關係而產生的力量，是絕不會因為生產關係的變遷而忘却，甚至於消滅的。「工人無祖國」的口號所以必致失敗，唯由於史實所標為至高無上的階級意識，所以每每為民族黨國所克服，自有其必然的理，而非偶然的事實。

試說政治關係與生產關係之間，也沒有必然的主從關係。政治關係固然有時受生產關係的影響，同樣地，政治關係也影響生產關係。例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之下，固然常會形成帶有資本主義色彩的政治，但在封建主義的政治之下，同樣會形成帶有封建意識的生產關係。歷史告訴我們，封建的經濟關係是基於封建的政治關係而產生。封建主的形勢，並不是根據大地主的地位而產生去公，相反的，乃是基於政治上的地位，進而為經濟上的大地主。馬克思眼光太幽，只看見當時歐洲一隅少數資本主義的國家，它們的經濟乃至政府，每每受着資本主義的標榜，而資本家時常着經營的勢力，要將國會議員，更甚而會而組織資本主義與聯邦政府，於是他們便據這種經濟的事實，宣佈以為古今各國的政治，一律受着經濟關係支配。據此以推論於封建時代，自然也以為王公的形政，乃是由於大地主的經濟根據而產生。對此，我們不難淺搜史乘，僅從中國古代的史實觀察，即知其非。我們古代的王公，不是由於血統的世襲關係而來，就是起布衣憑著手，再於政治鬥爭的勝利而形成。這些由政治上的封爵而產生經濟上的封邑的事實，究竟與經濟關係規定政治地位，還是政治關係規定經濟地位，我想歷史會教我們明白，而無須多辯。

實際上，我們並不認為生產關係在一切社會關係的地位是特別低，但也絕不認為特別高。政治，經濟，血統，文化等等社會關係，實際上是互為因果互為條件的一個連環。良好的經濟關係有時會促進良好的政治，同樣地

，良好的政治關係也能造成良好的經濟。民生主義主張以政治力量解決經濟，而不主張由階級鬥爭達到階級專政，就是確證政治可以規定經濟的一大原則。

在人羣的某一空間與時間的特定條件之下，誠然某種社會關係，也會形成其他一切社會關係的主要一環。就中國的革命來說，在辛亥革命以前，民族關係失調的嚴重性，曾經形成為社會關係問題中主要的一環。當時若不推翻滿清的政治統治，一切政治和經濟問題的改造都談不到。到了民國初年以後，軍閥當政，政治問題乃成為一切問題的中心，此時若不推翻軍閥，對外獨立與對內建設亦均無從着手。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入了訓政時期，經濟建設問題又成為一切問題的首要。抗戰以來，民族問題又回復到第一地位。總理列民族主義為三民主義之首，但又建國大綱中規定「起義之首要在民生」，並非先後矛盾，而正是這種因時制宜的措置。領導革命者在複雜時勢環境之餘，務當前急務的某種關係特別強調，以指示革命階級的奮鬥目標，是有其必要的。

但我們絕不可將因時制宜的革命策略，強調成永久不變的革命哲學。總理在與滿清作民族鬥爭的當年，絕不曾忘記了民族和民生的問題；總和在和日寇作民族鬥爭的今日，也毫不輕視政治和經濟的建設，這就足他們的偉大。假如馬克思也只會歐洲當時革命的戰略上，認為應該提出「經濟第一」「鬥爭至上」的口號，我們便該加以非難。可惜馬克思尤其是他的信徒們，誤把這種一時的策略，放大為永久的哲學，以為所有世界的歷史，無空閒別，無時無刻，必然是「經濟第一，鬥爭至上」，這就造成了對於人類社會關係上重大而偏頗的錯誤論調，妨害了哲學的純正性，同時也妨害了社會主義的有真正澈底的性質。

以上是就馬克思以生產關係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根據一點，指出其偏頗所在。至於以生產技術為生產關係的條件一節，乃是同一錯誤的另一方面。因為馬克思既認生產關係為一切關係的重心，但又看見當時歐洲的生產關係，實際上受着生產技術的支配。具體的生產關係，只有在在大規模機械化的工廠生產技術上才能形成。手工業的工廠乃至未經電氣化的農村，不能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也不夠形成馬克思主義的所謂社會化的生產關係！以

雖對一計算勞動價值的關係。假如認定生產關係是一切關係的樞軸與頭腦，那麼，這生產技術又成爲他底下的與頭上的頭。馬克司不假家產這種根下的與頭上的頭。於是便一說說法，不說生產技術是生產關係的根據，而說是總條件。這與馬克司和生產技術也給與生產關係的何便。

生產關係受着生產技術的限制，馬克司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生產技術究竟是在什麼呢？依我們看，生產技術乃是「文化」而不是「物質」。生產技術是人類聰明才智在生產事業各方面的結晶，並不是生產的本身，正如藝術不是藝術而是一種學術一樣。「技術」不但是生產事業方面獨有的，學凡政治學及國文教學裏都不有技術。凡是所謂「技術」，乃是人類聰明才智在實用方面的結晶，也就是人類文化在實用方面的表現。人類文化表明於原則實用方面便成爲學術，表現於實際應用方面便成爲技術。近代的生產技術內容與以前此種生產的技術，就是近代物質文明在生產事業方面的應用。這技術與文化，實際上乃是文化，而並非物質。馬克司以物質與經濟爲歷史的直心，但同時又認爲了物質與經濟受着生產技術（文化）的支配。這種矛盾的發生，如果不是由於馬克司根本就不理解生產技術是一種文化，而認爲爲一種物質的力量，就是由於他存心要拾物質與經濟的地位，掠奪了文化的功勞作爲物質經濟的功勞，以便論文化爲生產關係另一方面根據。但是，我們如能無成見，平心靜氣地觀察人類社會的關係，那麼，文化與經濟的關係，正和治政治與經濟與生產的關係一樣，乃是互爲因果互爲條件的連環之一。經濟有時影響文化，文化也有時影響經濟，生產關係不是一切人類關係的根據，而是人類關係表現中的一環。

依據上述的論點，我們已經可以大體認識了馬克司所入類社會關係的真相，以及根據與修訂一法則的不切實際。以下我們應該指出三民主義社會關係的若干要點，以作本文的結論，至少有下列三義，必須察察：

(一) 什麼是社會關係共同的重心——血統政治經濟文化等等社會關係與力量，是一個平等的連環已如上述。這樣一個平等的連環，如果只是在空際，而沒有一個重心，是會形成龍無首目，不但使我們的社會關係有混沌模糊之感，就是我們改造社會的工作，也會茫然無從下手的。從前社會論者若未將這共同

同的重心指出；而馬克司就這來環中抓住了一環，認爲一切理論與實際的重心，雖然偏執，雖然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但是比較一無所知爲重心的渾然觀念，畢竟強些。這就是馬克司主義所以獲得一部份青年信賴的原因。然而他所見到的重心乃是局部的偶然的，所以他得到的信賴，始終也是馬克司與暫時。人類社會全部永久的重心，直到連理的民生史觀才表指出，他說：「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經濟的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所以在人類關係的來環中，要知道那一環成爲當時社會建設的主要目標，就要看那一環對於當時社會生存與發展影響最大。有時是政治，有時是經濟，也有時是民族。馬克司信徒們無從認識此點，專執其說，無時無地不硬把經濟第一的老調。所以他們即在民族問題上最嚴重的時期，表面上迫於公意，雖不能否認民族至上，而內心裏就忘不了階級鬥爭時這話。他們以爲參加民族運動只是一種策略與手段，藉以達到階級鬥爭的目的。這種口是心非，表裏矛盾的病態，若不從民生史觀的理論上，從事於心理的治療，便隨時隨地都有混亂革命目標及破壞民族團結的可能。

(二) 什麼是社會關係共同的本質——我們說民生是社會關係的重心，是把社會關係當着一個來環環中的一環，而以民生當這一環中的點看的。不錯，這樣大的連環中，應該有一個中點，不過，這連環中的來環之間，有沒有共同的點呢？假如我們研底諸大行星的異同，環與環間的共同點是「圓」，社會關係與社會關係之間共同之點是「互助」；「互助」是人類社會關係所由產生的原因，也就是它的本質。人類如果不需要互助，就根本不需要社會關係。政治經濟血統等等社會關係，雖各有其特質，但基於互助而形成的點，却是彼此所共通的。血統的乃至民族關係是一種本能的自然的情感上的互助；生產的關係是一種經濟的勞動的在計上的互助；政治乃至文化的關係是一種聰明才智勞心勞力

行進的 Piano

進行的 Piamp

幻想是 Piano Piano 是張漫性的口舌

這類的詩，讀者的讀者可以作種種猜想，愚魯的讀者卻百思不得其解。總之，說一句老實話，文字和意義有欠通的嫌疑。如果文章清曉也分在內科外科，這些詩就要同時在兩方面找滅了。

「第二條路——金色的文字」

「十個瘋子九個」，鑿鑿塗抹的女人往往走此路；同樣，內容空前的詩常用變遷潤滑的辭藻。在新詩中，有幾個字（如「幽」「惡」「等字」走了紅運。有些詩人喜歡借用音樂、建築、繪畫等的名詞，如交響樂，三部曲，合共曲，前奏曲，自適美立體，多邊形，流線型，藝術之宮，象牙之塔……

有些詩人受了波德萊爾的影響，愛用陰森的字眼，試看許多詩的題目，便可一目了然：惡之花，花一般的罪惡，罪惡的羔羊，良夜與惡夢，魔鬼的舞廳，死而，死灰，招魂，姊妹的誘惑，夜哭，哀歌，青春的哀歌，幸福的笑歌，遊子的哀歌……

描寫女人。詩人們似乎特別注意乳房，讓我們舉一節段大膽的新詩，以資說明。

曾今可先在前詩集「愛的三部曲」，曾由日本人譯為日文，名喚一時，其中有小詩「今天的花兒」等篇，約值不錯。這一部集子是新詩壇來一時期

的代表作，你看它的題目多麼時髦：
一、前奏曲，二、第一部曲——愛的情愫，三、第二部曲——愛的沉醉，四、第三部曲——愛的幻滅。在第二部曲裏，有一首詩「但你不愛我」

其第一節爲：

「就是你的舌尖上塗着毒藥，我也要吻試，就是你的乳房下埋着地雷，我也要按摩！如果你病身生着瘡痍，我也來接近你！我不怕死，我什麼都不怕！但怕你不愛我！」

呵，讀者！讀到「乳房下埋着地雷」恐怕你的周身要不寒而慄吧！然而這不足怪，因為新詩受外國詩歌的影響。至深且巨，雖然二十世紀到了中華

我們詩人卻開創了「世紀」末的歐洲詩人，正在讀「醜態」。此詩第一行顯然脫胎於王爾德

的「莎樂美」。第二行比道生（Doan）描摹西納納（Ophelia）更無忌憚。不過首寫「鴉頭肉」是外國詩人的慣技，例如英國十六世紀著名詩人斯賓塞在「後庭婚曲」（Epithalamion）裏，讚美他自己的新娘，有這樣兩句：

「她的胸部像沒有藥藥的乳房，她的乳頭像含苞的百合花」。

第三行可以照例譯成詩人字科生（Eatonson）的「克拉克西達爾」（Estimate of Greene）

（Ophelia）：克拉克西達爾讚美了她的丈夫脫勞納斯（Eatonson），彼即或謂她無罪，坐在勞勞餐會，恰巧有一天脫勞納斯騎着駿馬，前來後擁，經過此處，丟給克拉克西達爾個小錢；他卻沒有一接近或「

按厚」路旁的癡婦人，也沒有看出她是昔日使他的神魂顛倒的美女克拉克西達爾！

當然，外國詩歌也經過這個詭計堆砌的階段。他們也好用香艷的詞藻，如「金」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第五世紀的拉丁詩人馬雲芳斯（Marcellin）常用肉麻的比喻，說些辭學是一個女人，有

「乳房」，有「金聲」（Goldensound）。英國十五世紀的詩人以綺麗的詩句作寓言，通稱為「金色的文字」（aureate language）。如蘇格蘭詩人敦巴（Dunbar）在「金盾」（Golden Targe）倒數第二節內，說道：

「呵，這鐘的高樞，誠桂運的利德該特，你們有諸語和舌舌」。

然而「金聲」是金石之聲，「金舌」是彷彿由黃金做成的舌頭，都可以聽得過去，我們的詩人說「金色的學子」，如果不是信口胡謔，就很費解了。

三、第三條路——象徵主義及哲理詩

赤襟裸的皇帝，在街上大搖大擺，兩旁的行人明明看見他一絲不掛，卻礙於禮，又恐別人懷疑自己「不稱職」，所以只好假裝閉合，帶着新的新衣（）。同樣，白話詩裏有許多不通的字句，是盡人皆知的，然而沒有人指摘，大約是怕別人懷疑自己不懂得新文學罷！試看下列一句有點兒怪模怪樣：

「他死着合體人唯一之吻那肢臂分爲多時的」

（朱湘「香石櫻集」第一篇「死詩」第一首之標題）。

如果你向一位這句不通的新詩人說他的詩句稍有問題，他也許會這樣反駁：「近來歐美盛行象徵主義或神祕主義的詩，你怎麼說外國人不通嗎？其實，外國人就真有不通的。這些主義害人不少。在第一次歐戰以後，歐洲的詩人們要開個新天地，力求解放，進出許多花樣：象徵主義，立體主

、未來主義、印象主義、表現主義、新表現主義……，一時鐘鼓齊鳴，詩壇變為擂台，非常熱鬧。單單法蘭西的新詩就分為三四十派主義。有些詩人更將標題寫得一個字支解為數段，排成菱形或圓形。有些詩人將詞源於國畫，例如未來主義的一個名畫，畫着海濱活動的十幾隻手，表示生命的活躍，但畫面上沒有人的身，沒有面目。

經過了一二十年，好像惡夢初醒，這些主義漸漸消聲滅跡了。韻律保存的，而且比較有成就的，是象徵主義。

法國象徵派的詩人魏倫（Verlaine）標榜「象徵主義」這首詩：「音樂在一切事物之上」。他不覺得兩個象徵派詩人布洛克（Blok），在一篇戲劇「兩生人」裏，和他自己開一場玩笑，令人發噱：他使劇中的詩人「暗指布洛克本人」。試一首詩給原館的侍者聽，詩人問侍者作何感想，侍者答道：「聽不懂，但非常悅耳，先生」。這難的詩和魏倫詩的元音虛度新派（Symbolist）的藝術詩，顯露音道而論。

自去年法國由停戰而屈服後，法國詩人再沒有餘暇，再沒有閒情逸致，來談談象徵主義，或另創新花樣了。可是，在二三十年以前，反對象徵主義的也不乏其人。

當象徵主義在法國流行時，詩人哥爾得茲基（Gautier）和古米勒夫（Guinier）於一九一二年，在聖彼得堡發起一種反抗的運動，被象徵派稱之為「反象徵主義」（Anti-symbolist）。他們是主張寫實的，注重事物的個性。他說：「他們愛一朵玫瑰花，因為它長得好看，卻不因爲它象徵神秘的純潔性」。

三 民主義

英國批評家徹斯頓（Chasleton）談到比利時戲劇家梅特林克的象徵劇說：「只有和詩人特殊心情完全相合的人，也許能明白劇中含義，否則只是毫無意義的」。

不過這些宗匠的作品多少還有些優點，我們的新詩人在空同學步，就很危險了。我們揣摩下列一詩，必能有所啟發：

「賜助中」（文叢月刊九卷三期）
「給安徒生答謝詞」
（你看你睜不開的眼睛
你聽你的心房
賜助加大手指，
手指加大腳掌」。

又有些詩人，故做寫些讀不懂的詩，自放高深。威克萊那生在「論新詩」（見生相書店出版新詩集「她的生命」之附錄）裏說：「新詩的句子，我不贊成過深——雖然我自己也犯着過深毛病」，弄到了晦澀的地步。句子是要深到，但要深到家，深到到極易的限度，換句話說，須把深的意思，藏在淺的字面上。這我可以隨便舉我自己的兩個詩來做例子：

「他的臉是一句苦話」（販魚郎）
「現在世界上愛人類，愛和平，講真理，講公道，並且是我們中國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也承認美國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在世界上和平一條道路上，一定能提攜努力，使得東西兩大共和國，在世界上做永久和平的兩個基柱，不使得世界人類再有不幸的浩劫。」這是編織許久以前所講的「段話」。最近編織的編造閑話及種種國務院的聲明，也都照樣地保證我們這兩大共和國今後定能提攜努力，推毀了這亂太平洋和平的日寇，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

「黑夜的沉睡如同快活的死，
早晨醒來了個奴隸的身子」。——（罪惡神黑手）

「第一句人是可以懂得，然而一個折了本的賭魚郎的賭場可以進出了。第二句香翠平下馬，踏面實在不平易。這深入淺出法最不容易，現自己在向這方面努力，也盼望大家一齊能這樣進上走。」

「除末尾一句話以外，戴先生的議論大致不錯，可惜他的言行未能一致。戴先生自以爲犯了「誤深」的毛病；其實，不是過深，即是晦澀或不通。我們「隨便」從「自己的寬限」裏舉出兩句，可以就着他的觀點：

「刺開二千年記憶的塵土，
露出了兩郎的豐采」。

這何嘗是深入淺出？又何必勸其他詩人向這深處磨還呢？

「這遺憾似是不通的哲理詩，是一種盲目的反動。原來初期白話詩潮既「呢喃」了，受人非難，詩人們自己也覺得過於混沌；於是他們或盡腦汁，要作翻深的詩句，而他們又不懂辨別白話；結果，用白話發表種種神祕的思想，就產生此文言詩更難解的白話詩，比「道德經」更玄妙哲理詩了。

「現在世界上愛人類，愛和平，講真理，講公道，並且是我們中國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也承認美國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朋友。我們在世界上和平一條道路上，一定能提攜努力，使得東西兩大共和國，在世界上做永久和平的兩個基柱，不使得世界人類再有不幸的浩劫。」這是編織許久以前所講的「段話」。最近編織的編造閑話及種種國務院的聲明，也都照樣地保證我們這兩大共和國今後定能提攜努力，推毀了這亂太平洋和平的日寇，以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

小烹集 (二)

「治大國若烹小鮮！」——莊子——

(六)

政治機構最重要的部門是組織與份子。組織是
 要合理化，要平均發展，要運用靈活；最忌的是重
 弊疊風，因人設官，尾大不掉故然要不得，但是此
 類弊端又何嘗行得過呢？關於份子問題，談中國政
 治機構的，很少同時談到；要知事是要人去做的，
 人不健全，百事都做不好。

談到中國政治機構組織方面的毛病，上文我已
 略說了不少，我希望在中央部門方面，能夠重新調
 整一下，收銷的取消，錯併的錯併，改組的改組，不
 充實的充實；總而言之，我們要從事業務方面的籌
 看眼下手去調整不要濫發些許「人」。「情」就
 於其間；以至公至正的態度隨之，我相信中國國民
 的兒女們，沒有那一個不盡力來擁護這個偉大的十
 作的。在省的方面：第一，省區似乎太大，應編
 緊執行中央七中全會的議決案，改劃省區，使其不
 至於這樣大得不合理，這樣繁重得運用不靈。第
 二，是省的地位要確定，到底他是受中央委託監督
 地方行政的機關，還是等於美國的州，是地方的機
 關呢？地的職權更要確定，最少應受限制，不能
 像現在許多省政府一樣，還像一個半獨立的國家，
 可以頒佈行政法令，可以增加賦稅，可以發軍隊，

紹興處

可以委官吏。至於說到縣：中國現行的縣制。固然
 輕重不能均衡。如地方財政確定等等，都不是件
 容易決定兩事。說到縣政府組織方面：更是千頭
 萬緒，等到要整理變通的。總而言之：中國現有的
 縣政府組織，依然停滯在原來就言譽之下，根本
 擔負不起一個現代化政治行政的責任，這個關係極
 大如果這一點不去設法改進，中國政治，永遠不會
 實際走上前進路。

談到中國政治機構中的份子方面，更叫我惴惴
 感，第一是用不得其才，第二是不善其用。第二是人
 不若五日來光之心，誰都有老死清室而危險。於是便
 爭敢不是人多而濫用，就是一旦任官，便思克勤
 克儉。許多人談中國政治都講：中國應該實行廉能政治
 不錯，但是廉能政治如何實現，是須具備主觀客觀
 條件的，決不是一個空泛的道德問題；如果，我們
 只偏重在這德方面去勸導告誡，結果是言之諄諄，
 而聽者藐藐。若是反其真從實質方面去着手，等到
 許多主觀客觀條件構成，自然而然地廉能政治會實
 現，到那時不廉不說的人們，根本站不住，你想叫
 他們不廉不能，反而做不到。我們只要看看中國的
 海關郵政，為什麼比較中國其他的一切政治機構與
 國營事業都上軌道呢？復原簡就是海關郵政，經過
 外國人的手，他們代我們是立好了一個組成份子的

選拔與保障的合理制度。海關郵政能夠建立這個合
 理的人事制度，為什麼中華民族整個的政治機構，
 就不能夠建立這個合理的制度呢？

總說在「現代行政人員須知」的詞句中會說：

「現在使我們的工作不能生效，政治不能進步之最
 大的毛病有三種：第一就是行政系統複雜，一切事
 權和責任不能專一，因此一切的事情，窒礙難行，
 沒有人肯來負責做事，也沒有人能放手做事。有
 責任便互相推諉，有權利則彼此爭奪，所有兩時間
 和精力，統統用於糜費，全部工作，不過是敷衍
 面。甚至還要發生一些無謂的糾紛，增加許多意外
 的麻煩，使大家的力量，互相抵消；整個的工作，
 陷於停滯……再講第二個大毛病，就是關係感情
 不宜時調。無論上下，不經過時間之可貴，與國
 保之重大，隨便做什麼事，沒有時間的規定，也不
 注意節省時間，限期完成。所以一個公事下去，不
 僅隔天沒有回報，就是過一個星期一個月乃至於過
 一年還得不到一個報告，即便有報告，也因為平時
 因循怠惰，臨事推諉，臨時也只好敷衍塞責……
 還有政治上第三個通病，就是政治上一切工作，似
 近萬端，不能由小而大！……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工作，
 範圍非常廣泛，沒有一個標準，緊急重輕不能
 斟酌，先從本末不知分別，每每急要趨而簡易的
 事情丟了不來實做，而事從寬深大繁雜的地方拚
 命空談……永遠做不出什麼成績，因此政治上亦
 永遠不能見有進步。」